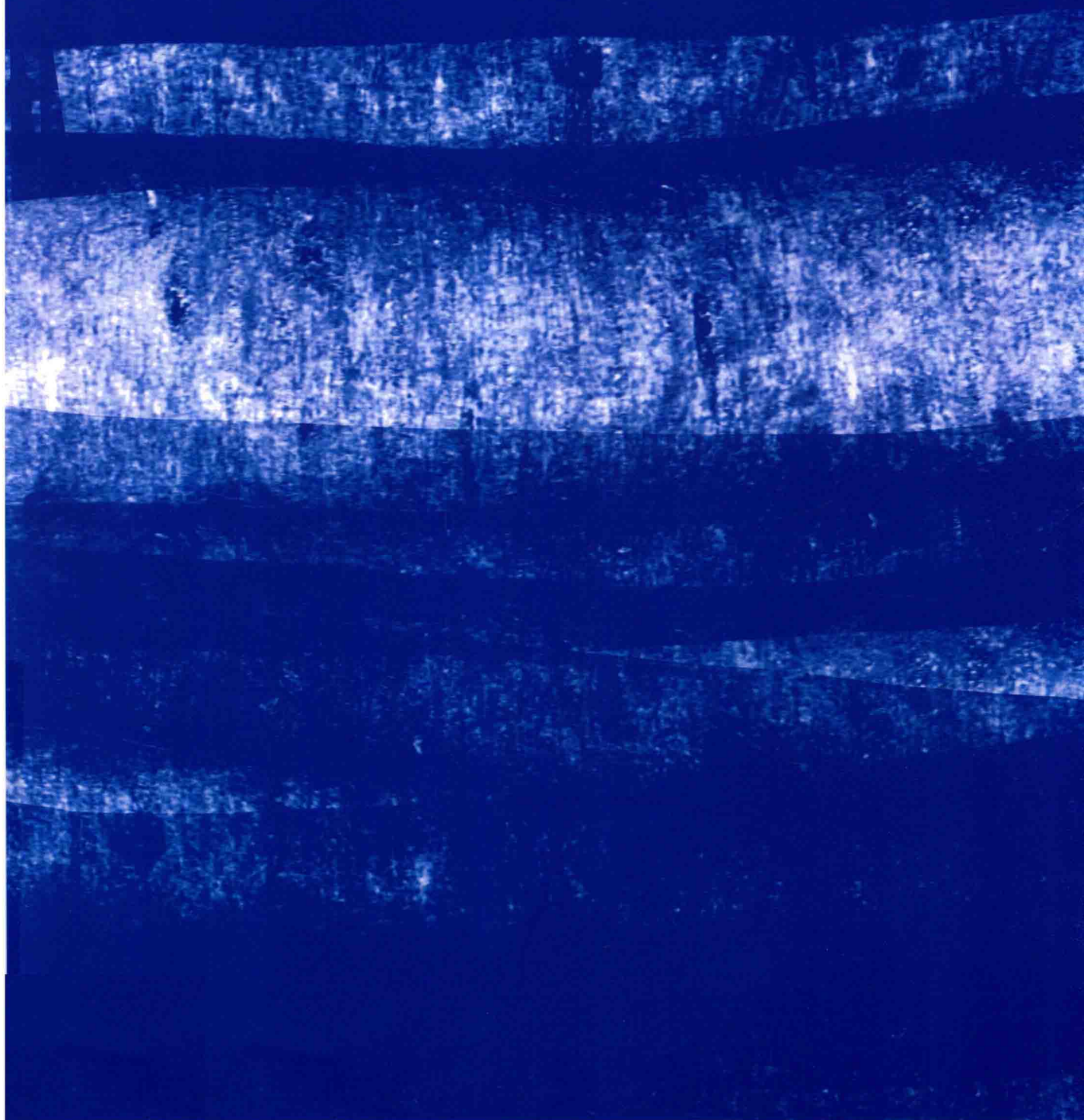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二十編

林慶彰主編

第14冊

王夫之詩學思想研究

崔海峰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王夫之詩學思想研究／崔海峰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民 104〕

目 2+190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二十編：第 14 冊）

ISBN 978-986-404-003-2（精裝）

1.（清）王夫之 2. 清代詩 3. 詩學 4. 詩評

030.8

103026839

ISBN-978-986-404-003-2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二十編 第十四冊

ISBN：978-986-404-003-2

王夫之詩學思想研究

作 者 崔海峰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5 年 3 月

定 價 二十編 21 冊（精裝）台幣 3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王夫之詩學思想研究

崔海峰 著

作者簡介

崔海峰，男，祖籍山東蓬萊，生於遼寧康平，文學博士，遼寧大學文學院教授。長期從事文學理論的教學與研究，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文論。先後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哲學系（1986）、北京大學哲學系（1991）、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2001），曾在江蘇省揚州大學文學院博士後流動站從事研究工作（2004～2006）。著有《王夫之詩學範疇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此書增訂本為《王夫之詩學思想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曾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船山學刊》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多篇。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王夫之與明代文學思潮研究」（2012）。曾獲北京師範大學榮譽校友稱號（2012）。

提 要

明清之際，王夫之（1619～1692）的美學、詩學思想博大精深，處於最高水平，其意義和價值日益彰顯。本書側重從範疇、命題的角度研究王夫之的詩學思想，選取其中很重要而當代學界關注得很不夠的問題加以探討，試圖在學界以往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展示其集大成式的總結性和別開生面的創新性。

王夫之生逢亂世，有感於詩教與世道人心的因應關係，試圖振興業已衰落的詩教，其溫柔敦厚的詩教觀，既有鮮明的時代色彩，又有普適的理論意義。他用「情」把興、觀、群、怨貫通起來，用「興觀群怨」把詩人、作品、讀者貫通起來，用博古通今的眼光和心胸，提倡詩歌導天下以廣心，把從孔子起發展演變著的興觀群怨說加以總結和闡發，在有意無意間創立了他本人的興觀群怨說。

「以詩解詩」是王夫之提出的詩歌解讀與評論的基本原則，突出強調詩的審美與藝術特性，推崇詩的聲情動人的藝術魅力。王夫之的艷詩論既獨特又切合中國藝術精神的基本觀念，其衡量艷詩佳作的標準有艷而不俗、麗而不淫、平淡從容、聲情動人等。王夫之注重比興寄託的抒情傳統，推崇即景會心的審美感興，鞏固並提升了含蓄在中國詩學史上的地位。

王夫之的雙行說主要是指詩歌情景妙合境界中的情景雙行，在情景交融達到極致狀態（妙合）時，景語即情語。這是莊子兩行說的基本精神在詩學領域的改造和拓展，是中國詩學情景關係論的新創。

此外，本書也用一定篇幅論及王夫之詩學中的性情論、心目論、神理論、悲壯論，等等。



目

次

緒 論	1
一、王夫之詩學何以在清代缺乏影響	1
二、王夫之詩學思想研究概述	5
三、王夫之詩學的哲學基礎	9
四、王夫之詩學的儒家立場和道家影響	14
五、王夫之詩學的範疇系列	17
六、王夫之詩學研究的意義	19
七、本文工作簡介	20
第一章 從王夫之看「溫柔敦厚」的詩教觀	23
第一節 「溫柔敦厚」的提出	23
第二節 「溫柔敦厚」的思想淵源	26
第三節 從溫柔敦厚到溫厚和平	28
第四節 別開生面——王夫之的詩教觀	30
第二章 興觀群怨說——從孔子到王夫之	37
第一節 詩可以興	40
第二節 詩可以觀	42
第三節 詩可以群	45
第四節 詩可以怨	46
第五節 隨所「以」而皆「可」	52
第六節 攝興觀群怨於一爐錘	57
第三章 從莊子的兩行說到王夫之詩學中的 雙行說	63
第一節 莊子的兩行說	63
第二節 王夫之對莊子的兩行說的解釋和接受	64
第三節 王夫之詩學中的雙行說	70
第四章 王夫之詩學中的「以詩解詩」論	79
第一節 「以詩解詩」的針對性	79
第二節 「以詩解詩」的思想淵源	85
第三節 「以詩解詩」的詩學意義	90
第五章 王夫之的豔詩論	95
第一節 豔情與淫情	95
第二節 豔詩中的宮體詩	99
第三節 豔詩與亡國之音	102

第四節 豔詩佳作的衡量標準·····	107
第六章 王夫之的興論·····	111
第一節 「興」範疇的多層次涵義·····	111
第二節 興論的特色·····	115
第七章 王夫之的悲壯論·····	125
第一節 詩學背景·····	126
第二節 王夫之何以推崇悲壯·····	128
第三節 藝術表現方式·····	131
第八章 王夫之的含蓄論·····	133
第一節 詩的比興傳統與含蓄·····	133
第二節 含蓄論的詩學背景·····	135
第三節 從勢、忍、居約致弘看含蓄·····	137
第四節 結語·····	139
第九章 王夫之的自然觀·····	141
第一節 自然觀的詩學背景·····	141
第二節 自然在有意無意之間·····	143
第三節 巧參化工，無筆墨痕·····	144
第十章 王夫之的雅俗論·····	147
第一節 能興即雅·····	147
第二節 雅的審美特徵·····	149
第十一章 王夫之的性情論·····	153
第一節 性情論的哲學基礎·····	153
第二節 性情論的詩學背景·····	155
第三節 王夫之對性、情、欲的辨析·····	156
第四節 結語·····	158
餘 論·····	161
一、理·····	161
二、神理·····	165
三、神秘觀念·····	172
四、心目·····	177
參考文獻·····	185
後 記·····	189

緒 論

一、王夫之詩學何以在清代缺乏影響

王夫之有很深的詩學修養。他自己曾說：十六而學韻語，閱古今人所作詩不下十萬。他在 25 歲時曾把自己的詩編刻一集，此後無論處境如何，都不曾中斷詩歌創作，直到去世前寫出絕筆詩為止。在他留下的大量詩文作品中，僅詩詞就有約兩千首。由於種種原因，王夫之在明清時期的詩壇沒有多大影響。20 世紀以來，王夫之的學術思想廣為傳播，他被尊稱為文學家、思想家等。人們有機會讀到他的詩，可是，他的詩仍然沒有什麼影響。很多文學史方面的著作對其人其詩隻字不提。我們不能說他的詩在多大程度上被埋沒了，只能說他的鑒賞力遠遠高於創造力，他的鑒賞力足以使他成為一流的詩學評論家、美學家。

王夫之的詩學著作主要有《夕堂永日緒論》、《詩譯》、《詩廣傳》、《楚辭通釋》、《古詩評選》、《唐詩評選》和《明詩評選》等。此外，他撰有《李詩評》、《杜詩評》等詩學著作，均已散佚。至於他是否撰有《宋詩評選》，學界尚無定論，其子王啟的《大行府君行述》（手抄本）不曾提到這部據傳已佚的著作，而王啟的學生曾載陽、曾載述在湘西草堂初刻本《夕堂永日緒論》後面的附識中說王夫之選評過宋元詩一帙。現存的王夫之詩學著作中包含著博大精深的詩學、美學思想，至今遠未被發掘出來。如果把王夫之和黑格爾相提並論，稱他們各自的理論分別代表了中西古典詩學和美學的最高水平，絕非過譽。^{〔註 1〕}與當代學者的高度評價形成鮮明反差的是，王夫之詩學在清代

〔註 1〕 參見陶水平：《船山詩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 頁。

缺乏影響。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以下我們僅從王夫之的學術著作及思想在清代的傳播這一角度加以簡要解釋。

1651 年後，王夫之除因避難、訪友和觀察局勢去過湖南一些地方（只離開湖南到江西萍鄉一次）外，絕大部分時間在湖南衡陽的家鄉隱居，僅在金蘭鄉「敗葉廬」和石船山下的「湘西草堂」就各住十餘年。他潛心於學術研究，從理論上深刻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極力弘揚中華文化傳統和詩學精神。王啟說他從辛卯（1651 年）至辛未（1691 年）四十年矢志不渝，用力不懈，其著述「諸種卷帙繁重，一一皆楷書手錄。貧無書籍，紙筆多假之故人門生，書成，因以授之，其藏於家與子孫言者無幾焉」（《大行府君行述》）。王夫之的著述卷帙浩繁，在散佚頗多的情況下，現仍存 95 種，380 餘卷，約 800 萬字。其中，哲學著作主要有《周易外傳》、《尚書引義》、《張子正蒙注》、《思問錄》、《讀四書大全說》、《老子衍》、《莊子通》等。史學著作主要有《續春秋左氏傳博議》、《讀通鑒論》、《宋論》、《黃書》等。他的詩學著作均寫於晚年，《詩廣傳》於 1683 年定稿，《楚辭通釋》在 1685 年寫成，《夕堂永日緒論》在 1690 年寫成，《古詩評選》、《唐詩評選》和《明詩評選》等詩文評類著作大致完成於 1690 年以前的幾年。在王夫之生前，除一本自刻的詩集外，所有著作都不曾刊刻問世。因此，他的詩學思想不為世人所知，對當時詩壇沒有產生影響。

王夫之去世後百餘年，其學術思想仍湮沒不彰。乾隆年間，浙東史學家全祖望廣泛搜集明末遺老事跡，汲汲為之表彰，但他對王夫之幾乎一無所知。嘉慶年間，江藩撰《國朝漢學師承記》和《國朝宋學淵源記》，評述了清代九十餘位漢學家和宋學家的學術思想，其中竟無隻字論及王夫之。清政權建立後，一方面標榜文治，通過開設博學鴻詞科和明史館等途徑，籠絡漢族文人；另一方面又大興文字獄，著力鏟除一切不利於其統治的思想。而在王夫之的大量著作，尤其是《讀通鑒論》、《宋論》、《黃書》、《噩夢》、《永曆實錄》等史部著作和《悲憤詩》、《續悲憤詩》、《章靈賦》等集部著作中，反清復明的思想溢於言表，諸如「夷狄」、「醜夷」、「逆夷」等詆滿文字觸目可見。用當代學者鄧樂群的話說，正是因為清政府的文網峻嚴和船山著作的抵觸良深，才造成王夫之學術著作及思想長期湮沒不彰的局面。

晚清學者鄧顯鶴曾將王夫之學術思想湮沒不彰的原因歸結為王夫之本人的堅貞自埋和門人故舊的無力推挽，這是有道理的。在他看來，王夫之多聞

博學，志節皎然，不愧顧炎武、黃宗羲兩先生，「先生竄身瑤峒，絕跡人間，席棘飴荼，聲影不出林莽，門人故舊，又無一有氣力爲之推挽，歿後遺書散佚，後生小子，至不能舉其名姓，可哀也已」（《鄧刻船山著述目錄》）。後來梁啟超在論及湖南之學風沿革時，提出與鄧先生一致的看法：王夫之以孤介拔俗之姿，沉博多聞之學，注經論史，著作等身，巍然爲一代大師，然處偏僻之地，與東南文物之區不相聞問，門下復無能負荷而光大之者，是以其學不傳（《飲冰室文集》卷四十一）。梁先生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以「畸儒」指稱王夫之：「他生在比較偏僻的湖南，除武昌、南昌、肇慶三個地方曾作短期流寓外，未曾到過別的都會，當時名士，除劉繼莊（獻廷）外，沒有一個相識，又不開門講學，所以連門生也沒有。」這段話不夠確切，王夫之還去過桂林、梧州、萍鄉等地，他與方以智是好友，羅正鈞《船山詩友記》云與船山友誼者百五十有六人。王夫之雖未開門辦學，但並非沒有門生，東南章有謨作爲門生跟隨他多年。1657年他隱居家鄉後，陸續招收弟子十餘人。但大約受他影響，他一生所授之弟子皆近於隱士型人物，沒有一人顯赫於世以光大師門。就處世的一般態度和狀況而言，上面所引梁先生的話大致是不錯的。王夫之年輕時曾參與「行社」、「匡社」的事務，這本與時尚相合，但他後來對此作過反省：「崇禎初，文士類以文社相標榜，夫之兄弟亦稍與聲氣中人往還，先君知之，輒蹙眉而不歡者經日。……大約窺先君之志，以不求異於人爲高，以不屑浮名爲榮。」（《家世節錄》）在學術思想的各個領域，他不趨附門庭宗派，不標新立異，讚賞「好驢馬不逐隊行」的俗語。據王啟的學生說：先生卷帙繁重，難於問世，且問世亦非先生意也，先生嘗言「世之言詩文者，各立門戶以爭名場，吾名心消盡，所評論者藉以永日而已」。由此我們不難理解王夫之的詩學思想何以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不爲世人所知。就連王夫之的家鄉在當時都不傳其學。王啟說王夫之晚年居於湘西蒸左之石船山，「蒸湘人士莫傳其學，間有就而問字者，稱爲船山先生。……人士之贈答者，又稱夕堂先生焉」（《大行府君行述》）。如今，一提「妙悟說」、「性靈說」、「童心說」、「格調說」、「神韻說」和「境界說」等，學過美學、文學的人大都知其創始人，而一提王夫之，能說出其詩學之大概的人卻不多。個中原因，上面有所論及。

1705年，與王啟相知的潘宗洛在《船山先生傳》中說：余所得見於王啟者，《思問錄》、《正蒙注》、《莊子解》、《楚辭通釋》而已。當時王啟解釋說：

「先人家貧，筆札多取給於故友及其門人，書成因以授之，藏於家者無幾焉。」（《船山先生傳》）這與王啟在《大行府君行述》中的說法是一致的，既不違背王夫之著述的大體情況，又是審時度勢、巧妙應付的遁辭。王啟在《湘西草堂記》中說：迄壬申而先子奄背，啟僅固遺書於屋右閣，而火災蟻蝕之害，其震驚怵惕不一次者也……迄啟年六十，從遊者數十人……從遊之士及姻友之有力者，續捐資刊先子遺書數種，藏版於右閣。王啟先後刊行了王夫之的十多種遺書，其中包括《夕堂永日緒論》，印數和發行範圍不大。後來的事實證明，王啟等人的小心謹慎是完全必要的。據劉人熙記載：乾隆時，呂留良文字之獄波及船山，以兵圍搜，幸取去《稗疏》數種無忌諱之辭，入之四庫，餘匿而免。由此可以理解王夫之的後裔何以不敢將遺書輕易示人。考《四庫全書》總目和《清代禁燬書目》，清政府共搜羅到王夫之的 15 種著作，其中列入《四庫全書》經部的僅 6 種（另附目 3 種），而列入禁燬書目的卻有 9 種，這 9 種全是集部之書，是王啟自以為比較妥當才加以公示的，卻仍被禁燬。

1840 年，在鄧顯鶴（湖南新化人，人稱「湘皋先生」）主持下，船山遺書首次系統校刻於湘潭，刊成經部著作 18 種，計 150 卷，定名為《船山遺書》。此後幾年，又陸續有人校刻了王夫之的《讀通鑒論》、《宋論》、《老子衍》和《莊子解》等 7 種著作。鄧刻《船山遺書》功不可沒，但因種類單調（僅限於經部之書，不包括詩學等方面的著作），卷帙有限，加上印行不多，故流傳不廣。1865 年，在曾國藩、曾國荃兄弟的主持下，船山遺書覆刻完成。曾刻《船山遺書》遠較鄧刻本系統和完整，在經部之外，又增刻了史、子、集三部之書。全書共 54 種，計 288 卷。王夫之的主要著作大多已納入此書，但《古詩評選》、《唐詩評選》和《明詩評選》等詩學著作未被刊刻。王夫之的學術思想自此「大倡於湖湘而遍於天下」。長期沉寂的湘學界，一度因研究船山學說而空前活躍起來，著名學者有郭嵩燾、王闓運、王先謙、劉人熙和譚嗣同等人。譚嗣同對王夫之推崇備至，認為「五百年來學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王夫之的實存哲學思想、歷史進化論和民族民主思想給維新派的變法理論注入了有益的因素。他的「攘夷」思想、光復思想、民族獨立自強思想給清末民主革命派提供了較充分的理論依據，他的民族氣節和鬥爭意志亦給予革命派人士以良好的影響。章士釗在 1903 年曾說：船山之史說宏論精義，可以振起吾國之國魂者極多。1961 年紀念辛亥革命 50 週年時，章氏又說：果也！辛亥革命之前，船山之說大張，不數年而清室以亡。

總之，王夫之的哲學、倫理、政治等方面的思想在清末廣為傳播，影響很大，而其文學、詩學等方面的造詣，卻未引起廣泛關注。

王夫之的古近體詩評選（《古詩評選》、《唐詩評選》和《明詩評選》）諸作，於其所有著述中刊行最遲，版本最少，書亦最殘，其出版時間為 1917 年（民國六年），版權頁注明校印者為湖南官書報局。1933 年（民國二十二年）上海太平洋書店出版《船山遺書》，收入上述著作重印。但這三種著作在問世後的大約半個世紀裏仍未引起學界的重視。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冊於 1934 年問世，下冊於 1947 年問世）說王夫之論詩之著作有《詩譯》與《夕堂永日緒論》二種（此前丁福保即據以輯入《清詩話》，合稱為《薑齋詩話》）。朱東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1944 年由開明書店出版）說王夫之「有詩譯一卷、夕堂永日緒論內篇一卷、外篇一卷，其尚論詩文者見於此。或合詩譯及夕堂永日緒論內篇為薑齋詩話」。郭紹虞、朱東潤等先生據以研究王夫之詩學的文本局限於《薑齋詩話》，這雖然不失王夫之詩學精神之大概，卻不利於把握王夫之詩學的真面貌。可見，王夫之的詩學著作在清代以後才全部問世（散佚的除外），對王夫之詩學的研究在清代以後才真正開始。

二、王夫之詩學思想研究概述

20 世紀以前，由於種種原因，很少有人深入探討王夫之的詩學思想，一些學者僅以隻言片語提及王夫之的詩論，缺乏學理的闡釋。1980 年以前，關於王夫之詩學的專題論文大約有 10 餘篇，考慮到史論著作中的相關研究，寬泛地說，這一時期關於王夫之詩學的文章不過數十篇。例如：方孝岳在《中國文學批評》（1934 年）一書中以數千字的篇幅對王夫之詩學給予高度評價，其批評眼光和標準較為圓融通達。蔣伯潛、蔣祖怡在《論詩》（初版於 1930 年代）一書中以百字的篇幅論及王夫之，認為王夫之反對門戶派別之見並以感人、感慨或率真為重要的評詩標準。朱東潤在《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1944 年）一書中認為，王夫之首言琢字之陋，進而論琢句，又從情景合一與「興、觀、群、怨」的角度立論。宗白華未曾寫專文評價王夫之，但他在《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1943 年）一文中多次援引王夫之的詩論用以闡釋意境，在他看來，王夫之的意境論代表著中國古代詩學的最高水平。郭紹虞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下冊分別於 1934 年和 1947 年出版）一書中對王夫之詩學給予較全面的評價。日本學者青木正兒在其專著《清代文學評論史》（1950 年）

中列出一節，就《薑齋詩話》論王夫之。臺灣學者張西堂在他編著的《明王船山先生夫之年表》中簡要評述了王夫之的文學批評觀。

1980 年代以來，王夫之詩學研究得到廣泛而深入的開展，在很多領域取得重大突破。很多美學史、文學理論史和文學批評史等方面的著作都列出專門章節探討王夫之的有關學說。如敏澤的《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葉朗的《中國美學史大綱》，黃保真等的《中國文學理論史》，張少康、劉三富的《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袁行霈等的《中國詩學通論》，孫立的《明末清初詩論研究》和張健的《清代詩學研究》等。

王夫之詩學遠比以往更受海外學者的重視。陳章錫有論文《王船山〈詩廣傳〉論禮詩樂》發表在臺灣《鵝湖月刊》（1986 年 3 月），他的碩士論文《王船山〈詩廣傳〉義理疏解》由曾昭旭指導，刊於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第 30 號（1986 年）。黃兆杰有論文討論王夫之詩學中的情和景並出版《薑齋詩話》英譯本（香港中文大學 1987 年版）。楊松年在 1970 年呈交香港大學的碩士學位論文以王夫之詩學為專題，由黃兆杰指導，論文經增刪修改，於 1986 年由臺灣文史哲出版社出版，題為《王夫之詩論研究》。郭鶴鳴曾以《王船山詩論探微》為題撰寫碩士論文，論文發表於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第 23 號，他在汪中指導下，於 1990 年完成博士論文《王船山文學研究》。李錫鎮的《王船山詩學的理論基礎及理論重心》是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 1989 年度的博士論文。博、碩士論文還有傅正玲的《王船山美學研究》（1989 年），翁慧宏的《王夫之詩學理論新探》（2000 年），游慧君的《王夫之唐詩評選研究》（2003 年）等。臺灣報刊論文有蔡振豐的《對王船山詩論中「以意為主」說的一點看法》（《臺大中文學報》第 4 期，1991 年），丁履《王船山的詩觀》（臺灣《中外文學》9 卷第 12 期），曾昭旭《船山論「道生於餘情」》（臺灣《鵝湖月刊》第 27 期），姚一葦《〈薑齋詩話〉中之主賓說》（《中外文學》10 卷第 6 期），李正治《王船山詩觀略探》（臺灣師大《師鐸》第 3 期），田素蘭《王船山〈楚辭通釋〉述評》（臺灣師大國文學報第 17 期）等。美國的黃秀潔曾發表《王夫之詩論中的情和景》（《船山學報》，1985 年第 2 期，陳荃禮譯）；美國的布萊克在《王夫之哲學思想中的人與自然》（華盛頓大學 1989 年版）一書的末章以「文學表現的本質」為題討論《薑齋詩話》；美國的孫築瑾在《龍口之珠：中國詩歌中景與情的探求》（密執根大學 1995 年版）一書中以專門篇幅討論王夫之的詩論；美國的宇文所安在《中國文學思想讀

本》(哈佛大學 1992 年版)一書中為《薑齋詩話》的翻譯和評析闢有專門一章；法國學者於連在其中國詩學專著《迂迴與進入》(三聯書店中譯本，1998 年，杜小真譯)中多次援引王夫之的詩學觀點並加以高度評價。

近年來關於王夫之詩學的專著大約有 10 餘種。蕭馳在以「王夫之的詩學體系」為專題的碩士論文的基礎上，寫出專著《中國詩歌美學》(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6 年版)，這一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王夫之詩歌美學研究的輻射性拓展」，十幾年後，他又出版《抒情傳統與中國思想——王夫之詩學發微》(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修正了他以往的一些觀念，從「現量」、「勢」、「興觀群怨」等方面探討王夫之詩學對中國抒情傳統的獨一無二的價值。熊秉真《王船山美學》(中國文史出版社 1991 年版)試圖展現王夫之美學思想的基本面貌和獨特魅力。譚承耕的《船山詩論及創作研究》(湖南出版社 1992 年版)較為系統地探討王夫之詩學思想。陶水平的《船山詩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1 年版)有深度，有突破，有創見，把王夫之詩學研究大大推進了一步。吳海慶的《船山美學思想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以他在山東大學通過的博士論文為底本。崔海峰的《王夫之詩學範疇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6 年版)以他在北京師範大學通過的博士論文為底本。

最近幾年，內地在王夫之美學、詩學方面的博士論文主要有：王峰的《王夫之詩學研究》(北京大學 1999 年)，羊列榮的《船山詩學研究》(復旦大學 2000 年)，唐鐵惠的《王船山美學思想研究》(武漢大學 2002 年)，涂波的《船山美學思想研究》(南京大學 2003 年)，李鍾武的《王夫之詩學範疇研究》(復旦大學 2003 年)，袁愈宗的《〈詩廣傳〉詩學思想研究》(山東師範大學 2006 年)等。

1980 年代以來，國內外報刊發表的王夫之詩學研究專題論文大約有 200 餘篇。這個數字雖然是 1980 年代以前這方面論文的 10 倍，卻僅相當於近年劉勰《文心雕龍》研究專題論文的 1/10。從論文和專著的數量看，近年王夫之詩學研究有長足的進展，但這方面的學者仍相對較少。

綜觀 1980 年代前後百年來的有關論著，可以看出王夫之詩學研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關於情與景。情景關係歷來是王夫之詩學研究中的主要論題，較早受到關注，也多為海外學者所研討，這方面的文章數量較多。學者們的觀點不盡相同，但大體上認為：王夫之詩學的基本出發點是詩達情，其核心問題是

情景關係，王夫之的重要貢獻在於從「情景相生」的藝術構思到「情景交融」的藝術表現等一系列重要問題上辯證、深刻地論述了情景關係。

學界在這方面的研究較充分，較成熟。因此，本文將從新的角度討論這個話題。

2、關於意與勢。學界早已把「意」與「勢」視為王夫之詩學的核心範疇，但在「意」與「勢」的涵義等問題上，有較大分歧。張世英、葉朗等人較準確地把握了王夫之的「以意為主」和「俱不在意」的涵義及其理論價值。張晶較準確地把握了「勢」的涵義，他在《王夫之詩歌美學中的「勢」論》（《北方論叢》，2000年第1期）一文中說：「勢」的主要意蘊在於「咫尺萬里」的審美張力、曲折迴環的蘊蓄感以及超越於筆墨之外的力度感、穿透力。

這方面的主要問題已基本解決，因此，本文將不予專門討論。

3、關於興觀群怨。學者們大多從藝術的宗旨和鑒賞的角度對王夫之「興觀群怨」說的淵源和內涵加以探討，也給予高度評價。李中華、吳家振、藍華增、黃保真和張少康等人都認為：王夫之對孔子的「興觀群怨」說作了新的發揮，加進了全新的內容，達到了一個他人難以企及的高度，較大幅度地突破了儒家詩教的範圍。王夫之提出的「作者用一致之思，讀者各以其情而自得」的命題也普遍得到學界的高度評價。

王夫之的「興觀群怨」說和上述命題既有突破儒家詩教的歷史意義，又富於現代意味，值得進一步探討。

4、關於神理。作為王夫之詩學的一個核心範疇，「神理」日益引起學界的重視。這是一個難以準確把握的範疇，對此可謂眾說紛紜。周頌喜、張世英、陶水平和張晶等人對「神理」及相關命題的闡釋較為準確。例如：在周頌喜看來，「神」是指詩人的神思，「理」是指客觀對象的物理。張世英指出，「神理」既是理，又超乎理之上，是超理性的東西。

「神理」一詞源於《莊子》，偶見於六朝的詩和《文心雕龍》中，此後長期在文論中空缺，直到明清時期，「神理」成為詩學和小說評點等領域的常用範疇，其內涵約定俗成，論者把它作為重要的批評標準使用時，一般不界定其內涵。

本文擬對王夫之詩學及明清文論中的「神理」範疇加以簡要考察。

5、關於意境。雖然宗白華早在1940年代就把王夫之的意境論視為古代詩學的最高水平，但晚近學者在研究王夫之詩學時較少論及意境，這方面的

專題文章屈指可數。葉朗和古風等人對王夫之的意境論較為重視，所作的評價也較為中肯。葉朗認為：王夫之推崇虛實結合的意境，表現在他對「規以象外，得之圓中」和「影」、「聲」等問題的強調。古風等人認為：王夫之從詩歌創作過程中系統地論述了意境的生成和結構問題，從多學科結合的學術視野把握住了意境本質。

筆者就此曾發表專題論文。本文將避開這一專題。

6、關於現量、即景會心或興會。與海外不同，大陸學者早在 1980 年代初就對王夫之的現量說給予高度重視。劉暢、葉朗、蕭馳、張晶和陶水平等人都有這方面的專論，基本解決了相關理論問題。童慶炳等人曾對王夫之的「即景會心」說加以探討。

筆者曾發表論文《王夫之詩學中的興會說》。本文將避開這一專題。

7、關於王夫之詩學的體系和歷史地位。王夫之的詩學體系是中國古典詩學的總結形態，具有綜合性和創造性等方面的特徵，這在學界已無多大爭議。程亞林認為，王夫之建立一個「寓體系於漫話」的詩學體系；葉朗認為，王夫之建立一個博大精深的以詩歌審美意象為中心的美學體系，這是中國古典美學的一種總結的形態；滕咸惠指出，王夫之的思想體系博大精深，其詩學理論以人性論為出發點，在繼承審美中心論詩學的基礎上，徹底改造了政教中心論詩學，從而把中國古代詩學提高到一個新階段。

顯然，王夫之詩學研究並未局限在以上幾個方面。但限於篇幅，這裡不再贅述。

三、王夫之詩學的哲學基礎

王夫之晚年有「六經責我開生面」的宏願和使命感。在他去世前兩年，劉獻廷南遊衡嶽，對他作出高度評價：「王而農先生，……隱居山中，未嘗入城市，其學無所不窺，於六經皆有發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氣，聖賢學脈，僅此一線耳。」（《廣陽雜記》卷二）1916 年（民國五年），劉人熙為王夫之的《四書訓義》、《古詩評選》、《唐詩評選》和《明詩評選》作序，其中有兩段話如下：

其為學，旁搜遠紹，浩瀚閎深，取精百家，折衷一是，楚人士稱之曰：「周子以後，一人而已」；天下學士宗之曰：「孟子以後，一人而已。」（《四書訓義序》）

「六經責我開生面」，誠哉其開生面也。……昔先師孔子反魯正樂，古詩三千餘篇，刪存三百篇，天道備，人事決，遂立千古詩教之極。而「興觀群怨」一章，即孔子刪詩之自序，是孔子開詩之生面也。船山《詩廣傳》又從齊、魯三家之外開生面焉。又評選漢、魏以迄明之作者，別雅鄭、辨貞淫，於詞人墨客唯阿標榜之外，別開生面。（《古詩評選序》）

我們知道，王夫之畢竟受歷史的局限，對於他不應該作過苛的要求，也不應該作過高的估計。但劉獻廷和劉人熙對他的學術成就及地位的評價並不為過。王夫之在哲學和詩學研究等領域別開生面，這已為學界所公認。

王夫之是明清時期最傑出的哲學家，其學遠承孔孟，近宗張載，於儒家經典皆有發明，且廣涉佛老莊學。如嵇文甫所說，在清初諸大師中，能極深研幾，切實做窮理工夫的，怕沒有誰比得上他。嵇先生認為，綜合王夫之的體系，而判斷他在中國近古思想史上的地位，可以說他是：宗師橫渠，修正程朱，反對陸王。^{〔註2〕}這在多年前針對王夫之與宋明儒學的關係所作的結論是很精當的。考慮到佛教等方面的因素，可以說王夫之的學術立場是：批斥佛老，反對陸王，參伍程朱，宗師周張。或者說他的學術風格是：否定陸王，批判佛老，改造程朱；淹貫經史，揚棄百家，推陳出新。^{〔註3〕}參照王夫之自己的說法，則應當說，他以周張為「正」，以程朱陸王為「正邪相勝」，而以他自己為「反歸於正」。在20世紀50年代前後侯外廬、熊十力等人討論王夫之哲學期間，陳榮捷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不反對以「唯物主義」一類的概念來分析王夫之哲學，但卻認為王夫之哲學中「氣作為物質力是意味著構成事物的一般質料，但器作為具體事物則意味著特殊的和有形的客體或規則」。他說：「可以清楚地看出，王夫之在顯然背離新儒學的同時，卻又在一定的範圍內繼承了新儒學的傳統。他雖然明確與王陽明相對立，但還是與朱熹相接近。……王夫之的哲學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義，他是一個具有獨立性格的思想家，通過批判宋代新儒學的理學和明代新儒學的心學，而走向一個新的方向。在這樣做的時候，他預示了其後兩個世紀內的中國思想，儘管他並沒有直接影響這時期中國的思想。」^{〔註4〕}陳先生的這番高論，也是後來多數中國

〔註2〕參見嵇文甫：《王船山學術論叢》，三聯書店1962年版，第109頁。

〔註3〕參見劉春建：《王夫之學行繫年》，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頁。

〔註4〕轉引自陳來：《詮釋與重建——王船山的哲學精神》，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9、10頁。